

地区大国代理人战略的差异性研究

——以中东宗教政治组织的赞助—代理关系为例

刘中民

摘要：代理人战略是冷战时期美苏等大国干涉地区事务的主要方式。冷战结束后，中等强国和地区性大国也时有采取代理人战略的情形，内涵与形式各有不同。对于伊朗与中东国家的什叶派政治组织形成的程度不等的合作关系，并被西方和部分中东国家学界解释为输出革命论、教派主义论和代理人论，存在过于简单化的问题。本文以赞助—代理关系理论为视角，以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政治组织为主要分析对象，对伊朗与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经研究发现，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是具有战略伙伴性质的委托—代理关系；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关系是松散的赞助—代理关系；伊朗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是处于建构过程中的赞助—代理关系，尚存在不确定性；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关系是失败的赞助—代理关系。通过比较研究，论文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关于伊朗与代理人建立赞助—代理关系的条件。存在边缘化的什叶派及其反政府的什叶派政治组织、政局动荡、存在较强的外部压力是成功建立赞助—代理关系的充分条件，什叶派政治组织所在国家政权脆弱是成功建立赞助—代理关系必要条件。第二，关于赞助—代理关系的过程和类型。伊朗与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赞助—代理关系的建立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其类型可划分较为紧密的关系和较为松散的关系。第三，关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伊朗与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建立赞助—代理关系深受其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也深受其国家利益诉求的深刻影响，而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远在意识形态之上。

关键词：伊朗 什叶派政治组织 赞助—代理关系 意识形态 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22)05-0048-39

导 论

在进入正文的分析前，需要对本文的核心概念代理和代理人进行简要讨论。代理首先是一种关系，是建立在赞助人（sponsor）和代理人（proxy）之间建立在某种形式的利益交换基础上的战略伙伴关系。^①在国际政治中，代理人战略主要是指一个行为体为获取政治、安全等利益，不直接出面，而是由国外代理人为其利益服务的互动过程。代理人战略中包括施动方（activator）与代理方（proxy）两个行为主体，施动—代理关系存在三个指标：一是在施动方与代理方之间存在直接的援助关系，这种援助包括资助、训练、输送武器和装备，军事人员运送，施动方指导代理方的行动方向；二是代理人与施动方之间存在共同的敌人；三是代理人与施动方的关系通常是持久性而非临时性的合作。^②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的主旨，笔者在这里强调两点看法，以求抓住赞助—代理关系的本质：首先，共同利益是维系代理关系的根本，一旦失去共同利益，赞助—代理关系将难以维系；其次，共同的价值观念有助于赞助—代理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但赞助—代理关系的双方并不必然存在共同信奉的意识形态，代理关系的核心是共同利益。

在关于代理关系的研究中，赞助人（sponsor）即施动者，也被称作“捐助者”（benefactor）“雇主”（patron）“委托人”（principal）等，通常是指要求他人为其进行战斗的行为体，“战斗”既包括军事意义上的常规或非正规战争，也包括政治暴力和政治破坏等行为。^③代理人是指为了回报赞助人支持，同时也为了实现自身利益，通过特定行为为赞助者服务的行为主体。

①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s Movement*, pp.11-12.

② 参见陈翔、熊燕华：《沙特与伊朗在地区博弈中的代理人战略》，第17页。关于代理人研究的中文文献可参考陈翔：《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为何频发》，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4期；陈翔：《内战为何演化成代理人战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马荣升：《代理人战争探析》，载《中国军事科学》，2017年第1期；文少彪：《利益、信息与偏好：美军与安巴尔部落镇压叛乱的代理人战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1期；董漫远：《利比亚代理人战争的跨地区影响及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4期。英文文献可参考：Geraint Hughes, *My Enemy's Enemy: Proxy Warfa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astbourne: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2; Yaacov Bar-Siman-Tov, "The Strategy of War by Prox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19, No.4, 1984; Brendan Sozer, "Development of Proxy Relationships: A Case Study of the Lebanese Civil War,"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7, No.4, 2016; Geraint Alun Hughes, "Syria and the Perils of Proxy Warfare,"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25, No.3, 2014。

③ Yaacov Bar-Siman-Tov, "The Strategy of War by Prox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p.266.

从本质上而言，赞助人和代理人的关系是工具性的，其基础在于“相互的义务和利益”。^① 在国际关系中，赞助者和代理人既可以既是国家行为体，也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但在现实中赞助者多以国家为主，代理人多以非国家行为主体为主。

赞助—代理关系建立的基础在于利益交换，一旦这种关系因赞助人、代理人单方面或双方面的变化导致利益基础松动乃至瓦解，就会导致赞助—代理关系的危机乃至崩溃。如果发生利益分歧，代理人将不再听从赞助人的命令，并偏离双方的协议，甚至颠覆赞助者的战略目标。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代理人甚至可与赞助人反目成仇。^②

赞助—代理关系的危机与双方所处不同环境和各自利益诉求变化密不可分。当利益发生冲突和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如赞助国政权更迭或代理人所在国家实现冲突和解，代理人和赞助者不再认为赞助—代理关系有益，因此将选择放弃赞助—代理关系。^③ 此外，代理人所在国家内部政治力量对比变化，特别是国家政权和作为外国代理人的反政府组织之间力量对比变化、外部干预变化，都有可能破坏原有的赞助—代理关系。^④ 这种情况是十分常见的问题，因此，赞助—代理关系双方特别是赞助人对代理关系的管理十分重要，也十分困难。当然，也有赞助—代理关系在双方长期合作后而走向战略伙伴的特例。

在战后世界历史中，特别是在冷战时期，代理人战略成为美苏等大国干涉地区事务的主要方式。在世界政治中，中东地区不仅是世界大国推行代理人战略的重点区域，地区大国也通过扶植代理人争夺地区主导权。这种现象是为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揭示的事实，但已有研究对地区大国对不同对象推行代理人战略的差异性却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以伊朗与主要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的赞助—代理关系为例，揭示地区大国代理人战略收效的差异性，进而修正对伊朗代理人战略的简单、片面的认知。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输出革命构成伊朗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Yaacov Bar-Siman-Tov, "The Strategy of War by Prox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p.269.

② Idean Salehyan, "The Delegation of War to Rebel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4, No. 3, 2010, pp.439-515.

③ Jan K. Gleiman, "The Future of War Is Here: Proxy Warfar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24, 2014, p.2.

④ Daniel Byman, "Outside Support for Insurgent Movement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6, No. 12, 2013, pp.986-987.

分,而在教派方面与伊朗具有亲缘关系的什叶派政治组织成为伊朗“输出革命”的重要对象。在此过程中,部分什叶派政治组织如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组织、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形成了程度不等的合作关系,并被西方和部分中东国家称为“什叶派新月地带”(Shiite Crescent)。这种现象是伊朗外交中一种较为独特的现象,即伊朗作为中东地区大国与非国家行为体——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力量组合。对于这种现象,学界的解释主要包括输出革命论、教派主义论和代理人论,综合起来便是“新月地带”论,即伊朗以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名义,把各种什叶派宗教组织扶植成代理人,进而建立所谓“什叶派新月”的势力范围。^①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看法对于从整体上观察和认识伊朗外交有其可取之处,但也存在着简单化、模式化和概念化的缺陷,忽视了伊朗外交的复杂性、多样性。

首先是“输出革命论”。这种观点认为,霍梅尼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输出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伊斯兰革命,最终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具体来说,伊朗希望首先在中东通过输出革命推翻亲美、亲西方的政权,建立伊斯兰政权,然后再向其他地区输出革命,直至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伊斯兰秩序。^②输出革命论把伊朗外交理解为立足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相对而言,这种看法较为符合革命初期伊朗的“输出革命”外交,但其缺陷和问题是忽视了伊朗作为“伊斯兰国家”^③和“民族国家”^④的双重属性,进而忽略了伊朗

^① Ofira Seliktar, Farhad Rezaei Iran, *Revolution, and Proxy Wars*,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1.

^② 相关论述可参见: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ouhallah. K. Ramazani, *Revolutionary Iran: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the Middle East*,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John L. Esposito, e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Its Global Impact*, Florida: the Borad of the State of Florida, 1990; Farhang Rajaei, *Islamic Values and World View: Khomeini on Ma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anham: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3; Ray Takeyh, *Guardians of the Revolution-Iran and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the Ayatollah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Dilip Hiro, *Iran under the Ayatollah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85。

^③ 在我国的大众传媒乃至学术界,一般意义上的“伊斯兰国家”通常是指大部分居民以伊斯兰教为宗教信仰的国家。此外,习惯上还有一个标准,伊斯兰会议组织的57个成员国,都是伊斯兰国家。但在伊斯兰主义特别是霍梅尼的思想中,“伊斯兰国家”概念有着严格的政治含义,其基本内涵是指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体现“真主主权”,在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领域全面推行伊斯兰化的国家,霍梅尼多称其为“伊斯兰政府”。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国家”思想》,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4期,第11-18页。

^④ 尽管包括霍梅尼思想在内的伊斯兰主义思想都反对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并试图以“伊斯兰国家”取代“民族国家”。但由于伊朗仍是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内的行为主体,因而仍是民族国家体系的一员。

的民族国家理性和国家利益。事实上，伊朗一方面具有通过教法学家治国体现“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属性；另一方面它又无法游离于既有的民族国家体系内，并有其特定的国家利益。“为了成功地驾驭这种二元性并实现其更广泛的地区目标，伊朗外交政策管理着战略、民族主义和宗教方面相互重叠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复杂相互依赖。从战略上讲，伊朗政权的最终目标，与世界政治中的所有战略行动者——国家一样，更具体地说是当前伊斯兰共和国的持续生存和主权。”^①“支撑革命输出的豪言壮语的更多是对政权生存和伊朗作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的关注。”^②因此，在霍梅尼去世后，特别是在温和派执政的哈塔米时期和鲁哈尼时期，伊朗外交并非简单的“输出革命”外交，基于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对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超越，是伊朗外交变化的重要表现。^③

其次是教派主义论。这种观点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作为以什叶派为基础的神权国家，以教派认同为基础，支持和扶植中东国家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的什叶派群体和组织，发起反对现政权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进而建立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并与逊尼派力量的代表沙特、土耳其等地区大国争夺地区影响力。^④教派主义论可以部分地解释伊朗对中东国家特别是黎巴嫩、伊拉克、也门、巴林等国家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影响，但伊朗的对外政策并非简单的教派主义。教派因素尽管在伊朗对外政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并不符合伊朗外交复杂多元的现实。事实上，在伊朗革命之初，出于增强伊朗革命的合法性以及“输出革命”等方面的需要，伊朗曾采取一系列举措刻意淡化自身的什叶派色彩。^⑤伊朗的对外政策也早已超越了教派认同，如伊

① Trevor Johnston, Matthew Lane, Abigail Casey, Heather J. Williams, Ashley L. Rhoades, James Sladden, Nathan Vest, Jordan R. Reimer, Ryan Haberman,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20, p.3.

② Ofira Seliktar, Farhad RezaeiIran, *Revolution, and Proxy Wars*, p.1.

③ 相关论述可参见Adam Tarock, *Iran'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90: Pragmatism Supersedes Islamic Ideology*,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1999。

④ 相关论述可参见：Nader Hashemi and Danny Postel, *Sectarianization: Mapping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Frederick M. Wehrey, *Beyond Sunni and Shia: The Roots of Sectarianism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Daniel Byman, "Sectarianism Afflicts the New Middle East," *Survival*, Vol. 56, No. 1, 2014。

⑤ 刘中民：《试析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以巴林问题为案例的分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2期，第140页。

朗对巴勒斯坦逊尼派组织哈马斯的支持，在特定时期内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合作，都表明伊朗也可以与逊尼派力量进行合作。^①不仅如此，伊朗与中东什叶派力量的关系也并非基于教派认同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合作，如伊朗支持的部分伊拉克什叶派组织、巴林的什叶派伊斯兰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并不认同伊朗的国家制度，但这并不妨碍伊朗与其进行程度不等的合作。因此，教派主义显然无法解释伊朗外交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一面，尤其难以解释伊朗与中东地区逊尼派力量的合作关系，以及伊朗与中东地区什叶派力量关系的差异。

最后是代理人论。这种观点把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政治组织视为伊朗的代理人，强调对代理团体的支持是伊朗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关键方面。有观点认为，伊朗经常利用赞助—代理关系来对抗对手、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引发直接冲突的风险；伊朗通过扶植代理人为其在中东地区输出革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平台，通过支持国外的代理人致力于推翻亲美政权，用替代的政权实现伊朗的影响力。^② 代理人论为认识伊朗与中东地区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认识路径，并多把地区冲突解释为伊朗与沙特甚至美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认识中东地区冲突的形成机制，但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二：其一，伊朗与其支持的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关系在程度上存在巨大差异，不可一概而论。如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是最为紧密的赞助—代理关系并具有战略伙伴关系的性质，而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力量的关系则十分松散，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尚处在构建过程之中。其二，代理人论对伊朗与其什叶派政治组织关系的差异性，特别是对环境条件、合作程度、成果收效的差异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解释。事实上，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伊朗与不同什叶派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存在巨大差异，并非伊朗支持的力量都能够转变为代理人，甚至在某些条件较差的国家如沙特等海湾国家遭遇严重挫折乃至失败，促使

① 相关论述可参见：Afshon Ostovar, *Sectarian Dilemmas in Iranian Foreign Policy: When Strategy and Identity Politics Collide*,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6; Frederic Wehrey, and Charles Wolf, Jr., *Understanding Iran*,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09。

② 相关论述可参见：陈翔、熊燕华：《沙特与伊朗在地区博弈中的代理人战略》，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1期；Simon Mabon, *Saudi Arabia and Iran: Power and Rivalr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6; Ofira Seliktar, Farhad RezaeiIran, *Revolution, and Proxy Wars*。

其不得不选择放弃。

因此，对于伊朗与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关系不能简单一概而论。“输出革命论”、教派主义论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身份政治等思想意识因素的作用，忽视了伊朗同样存在基于战略理性的国家利益；代理人论把伊朗与其支持的什叶派力量之间的关系约化为赞助—代理关系，即代理人战略中的施动者—代理人关系（activator-proxy relationship），但却忽视了受主客观条件制约而产生的巨大差异。因此，只有对伊朗与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关系的环境条件、合作水平、成果收效进行比较，才能相对准确地认识伊朗与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关系的差异性，这无疑也有助于认识伊朗外交的复杂性。鉴于此，本文以赞助—代理关系理论为视角，以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政治组织为主要分析对象，对伊朗与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本文拟验证以下三个假设：第一，伊朗与不同什叶派政治组织关系的发展深受后者所在国家环境的制约，环境优劣是决定伊朗与什叶派政治组织关系成败的重要因素。第二，伊朗与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关系水平程度不等，存在着合作程度不等的委托—代理关系形式，并且多处于根据环境条件变化的动态调整之中；什叶派政治组织并不简单充当伊朗的代理人，它们同样是自主性的行动主体，有其特有的政治理念和利益诉求。第三，伊朗与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关系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伊朗并非一味出于革命热情和身份政治输出革命，推行教派主义，而是根据环境条件和战略目标特别是国家利益决定其政策选择。

在伊朗与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的赞助—代理关系中，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是层级和水平最高的赞助—代理关系，双方的关系已经具有战略伙伴性质，而伊朗与其他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关系多属于较为松散的赞助—代理关系中，甚至因无法建立赞助—代理关系而遭遇失败。这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问题，即通过比较伊朗与不同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关系，解释赞助—代理关系建立的条件、不同赞助—代理关系的差异，进而揭示伊朗与不同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关系的差异性，进而避免对伊朗外交的简单化、模式化理解。本文认为，伊朗在对象国的什叶派政治组织中选择代理人的必要条件包括：第一，存在对政府严重不满的什叶派政治组织；第二，存在因地区形势、周边形势或外部干涉导致的动荡以及什叶派政治组织反对外来干涉的斗争；第三，对象国国家政权比较脆弱，无力控制国内局势并难以压制什叶派

政治组织，而伊朗有能力使该国的某一什叶派政治组织服从伊朗的领导。在这三个必要条件中，对象国政权脆弱是伊朗代理人策略成功的充分条件。

一、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具有战略伙伴性质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中，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是层级和水平最高、具有战略伙伴性质的委托—代理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伊朗通过考察黎巴嫩的环境条件，在众多什叶派政治组织中选择真主党作为代理人进行扶植和培养，并使双方的关系从代理关系发展到联盟关系，使伊朗通过与真主党的长期合作关系，在黎巴嫩政治和外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伊朗的支持和指导下，真主党从一个地下抵抗运动演变成黎巴嫩的主要政治参与者。^①真主党的发展历程及其与伊朗的关系也恰如有关评价所言：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很难想象真主党会从黎巴嫩南部小型、松散的什叶派团体演变成具有地区影响力的精明的、多功能的组织（a savvy, multifaceted organization）。当前，真主党代表着“国中之国”（a state within a state）。作为黎巴嫩最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社会行动者，真主党不仅是伊朗的代理人，更是伊朗真正的合作伙伴。^②

学界多认为，“黎巴嫩是伊朗输出革命最为成功的地方”^③，而伊朗与真主党的关系则是这种成功的标志。但是，伊朗与真主党从赞助—代理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进，得益于伊朗的代理人策略与黎巴嫩政治环境相契合，它既与伊朗通过扶植代理人进行革命输出密切相关，也与双方对彼此关系不断进行调整优化密切相关。

伊朗选择真主党作为其代理人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通过对黎巴嫩的政治环境加以考察，最终从诸多什叶派政治组织中选择了真主党。从政治环境方面看，教派矛盾引发的政治动荡，什叶派人口上升及其边缘化处境，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大量存在，黎巴嫩内战后国家的脆弱和衰败，以色列的入

^① Matthew Levitt, *Hezbollah: The Global Footprint of Lebanon's Party of God*,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8.

^②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16.

^③ 王宇洁：《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侵等因素，构成了伊朗在黎巴嫩扶植代理人的客观条件。真主党在意识形态上与伊朗更为接近，使伊朗在众多什叶派政治组织中选择真主党加以扶持，并使真主党取代“阿迈勒运动”^①成为伊朗在黎巴嫩最合适的代理人。伴随真主党成长为黎巴嫩的重要政治力量，伊朗与真主党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和巩固，并使双方的关系超越赞助—代理关系发展成为战略伙伴关系。

第一，什叶派政治力量的崛起为伊朗选择代理人准备了基本条件，相对于世俗民族主义组织阿迈勒运动，伊朗更青睐具有伊斯兰主义性质的真主党。

20世纪60年代以来，黎巴嫩教派矛盾日趋激化，不满现状的什叶派政治力量崛起。1974年，侯赛因·胡塞尼（Hussein el-Husseini）和穆萨·萨德尔（Musa al-Sadr）领导成立第一个什叶派政治运动——“被剥夺者运动”（the Movement of the Deprived），即“阿迈勒运动”（Amal）的建立，标志着黎巴嫩什叶派从被动状态向政治、社会和军事领域的行动主义转变的标志。^②

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和黎巴嫩什叶派之间就已经建立了联系，这为伊朗向黎巴嫩进行“渗透”创造了条件。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伊朗神职人员对黎巴嫩什叶派社区的教育和组织建设做出了贡献，并在伊朗的神学机构培训黎巴嫩学生，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真主党领袖的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③在伊朗期间，纳斯鲁拉学习了后来成为伊朗最高领袖的霍梅尼的学说，并成为霍梅尼思想的崇拜者和拥护者。^④

“阿迈勒运动”组织作为什叶派的政治代言人，在本质上是对内维护什叶派权益、反对教派分裂，对外主张维护黎巴嫩独立与统一，支持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民族主义组织。^⑤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也曾经向“阿迈勒运动”提供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伊朗曾向“阿迈勒运动”提供军事

① “阿迈勒运动”于1974年成立，全称为“黎巴嫩抵抗集团—被剥夺者运动”，该组织是一个以什叶派为基础的政治、军事混合体。“阿迈勒”的名称是阿拉伯语“黎巴嫩抵抗组织”缩写的音译，即“AMAL”，它恰好构成阿拉伯语的“希望”一词，所以又称“希望运动”。

② Eitan Azani, *Hezbollah: The Story of the Party of God—From Revolution to Institutional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55.

③ Ibid., p.50

④ Frederic Wehrey, and Charles Wolf, *Understanding Iran*,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09, p.87.

⑤ 刘中民：《论霍梅尼外交思想与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4期，第99页。

训练，以帮助其对抗以色列，但这是有限的、短期的支持，因为“阿迈勒运动”对于伊朗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①其原因在于“阿迈勒运动”的世俗民族主义性质使其并不倾向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同时也与“阿迈勒运动”当时与叙利亚更为接近有关。“当时叙利亚正在占领黎巴嫩，并已经开始投资和培养阿迈勒作为代理人。”^②

真主党是1982年脱离“阿迈勒运动”的人员组建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同时也受到了伊朗“输出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因为“对阿迈勒的世俗性质感到失望而与该组织分道扬镳”。^③与此同时，伊朗专门建立了推动“革命输出”的“黎巴嫩伊斯兰革命协会”，致力于在黎巴嫩建立“一个追随伊朗革命路线的什叶派组织，来代替以温和的世俗民族主义为方向的阿迈勒运动”^④。因此，伊朗对真主党的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⑤真主党的意识形态与伊朗的伊斯兰主义具有契合性，其目标是通过革命摆脱美国和法国对黎巴嫩的控制，在黎巴嫩建立伊斯兰政府，并且接受霍梅尼作为其宗教和政治权威。由此可见，在伊朗决定支持真主党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亲近（Ideological affinity）是确定潜在伙伴的一个主要因素”。^⑥在决定把真主党作为代理人的培养对象后，伊朗开始向真主党提供系统性的军事和经济支持。在1982年，伊朗曾派出一支约1500人左右的伊斯兰革命卫队（the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RGC）深入黎巴嫩的贝卡谷地，为真主党等什叶派组织提供训练、物资支持。^⑦根据有关文献，伊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花费了大约5000万美元来帮助黎巴嫩民兵。^⑧

第二，内战后黎巴嫩国家脆弱、什叶派的边缘化地位、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等内外因素，有利于伊朗和真主党之间的合作。

① Frederic Wehrey, and Charles Wolf, *Understanding Iran*, pp.88–90.

②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24.

③ Eitan Azani, *Hezbollah: The Story of the Party of God — From Revolution to Institutionalization*, p.60.

④ 王宇洁：《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第165页。

⑤ Laurence Louer, *Transnational Shia Politics: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Networks in the Gulf*, Hurst Publisher, 2008, p.171.

⑥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p.23–24.

⑦ Robin B. Wright, *Sacred Rage: the Crusade of Modern Islam*, New York: Linden Press, 1983, p.81.

⑧ Frederic Wehrey, and Charles Wolf, *Understanding Iran*, p.90.

1975年爆发的黎巴嫩内战，在本质上是黎巴嫩国家脆弱的产物，它导致的政治动荡和权威缺失，为伊朗向黎巴嫩进行渗透创造了条件。因为黎巴嫩内战既是教派矛盾的产物，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教派矛盾和什叶派的生存困境。在战争期间，黎巴嫩政府无法使什叶派免受来自基督教马龙派的攻击，^①这使得什叶派社区更容易接受外部援助。

以色列进入黎巴嫩南部并支持基督教马龙派，进一步加剧了黎巴嫩的教派冲突。入侵尤其伤害了什叶派社区，引发了他们对以色列的怨恨，并使什叶派迫切需要一支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力量。^②因此，以色列的入侵为伊朗进入黎巴嫩开辟了空间，并为其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机会，^③而其实现方式便是支持代表什叶派利益的真主党。1982年，以色列发动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为伊朗在黎巴嫩建立真正的影响力和探索潜在的伙伴关系创造了新的机会。”^④伊朗利用什叶派对以色列的强烈不满，抓住机会在叙利亚部署了5000名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然后又派出1500余人进入黎巴嫩贝卡谷地，并动员什叶派民兵组成新的反以色列力量，进而奠定了真主党的基础。^⑤

第三，黎巴嫩内战后伊朗与真主党之间的长期合作，特别是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战略层面相互信任，使双方关系走向具有战略伙伴性质的赞助—代理关系。

1992年，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任真主党秘书长，真主党还首次参加了议会选举，伊朗宗教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为此亲自对真主党表示了祝贺。与此同时，真主党采取了务实的举措，通过建立大量的社会福利机构、提供社会服务融入黎巴嫩的政治和社会生活。^⑥伴随真

① Yusri Hazran, “The Shiite Community in Lebanon: From Marginalization to Ascendancy,” Waltham, Mass.: Brandeis University, Crow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Middle East Brief*, No. 37, June 2009, p.4.

②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23.

③ Eitan Azani, *Hezbollah: The Story of the Party of God — From Revolution to Institutionalization*, p.57.

④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24.

⑤ Ibid.

⑥ Nicholas Blanford, “Iran & Region IV: Lebanon’s Hezbollah,” *Iran Primer*, January 28, 2015.

主党日趋成熟，伊朗还允许真主党进行自主决策。^①伊朗与真主党的关系也更加稳固，以致有研究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伊朗与真主党的关系更像是伙伴关系，伊朗大幅增加了对真主党的投资。^②有资料称，在1988~2002年间，通过真主党向黎巴嫩提供了9600万美元的援助。^③

为扩大真主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伊朗还帮助真主党建立了电视台，开设了媒体关系办公室。与此同时，伊朗继续为真主党提供意识形态指导、活动资金、军事训练、武器供应方面的支持。例如，2000年7月，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访问伊朗，得到了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接见；2005年内贾德当选总统后，纳斯鲁拉再度对伊朗进行了访问。另有资料显示，伊朗还向真主党提供了大量武器援助，并在伊朗德黑兰、伊斯法罕、马什哈德、阿瓦士等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营地对真主党武装进行训练，有数千名真主党武装分子在伊朗和黎巴嫩的营地接受了训练。据估计，伊朗每年对真主党的支持是1-2亿美元。^④

2006年真主党与以色列爆发冲突，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其在黎巴嫩内外的政治声望”，^⑤也成为伊朗代理人策略成功的突出表现。在冲突后，伊朗又出资帮助真主党进行重建工作，特别是通过提供武器增强其军事力量。有资料称，到2010年，真主党至少拥有4万枚导弹，比2006年战争前增加了166%。^⑥在伊朗看来，真主党已经成为伊朗最重要的地区合作伙伴，甚至视其为伊朗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朗前驻叙利亚大使阿里·艾克巴尔·穆赫塔塔希米普尔（Ali Akbar Mohtashamipur）曾明确指出：“真主党是伊朗统治的一部分……作为伊朗安全和军事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伊朗和真主党之间的

① Amal Saad Ghorayeb, *Hizbu'llah: Politics and Relig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pp. 67-68.

② Frederic Wehrey, and Charles Wolf, *Understanding Iran*, 2009, p.94.

③ Abbas William Samri, "A Stable Structure on Shifting Sands: Assessing the Hizbollah-Iran-Syria Relationship," *Middle East Journal*, Vol.62, No.1, 2008, p.41.

④ Matthew Levitt, "Hezbollah Finances: Funding the Party of God," in Jeanne K. Giraldo and Harold A. Trinkunas, eds., *Terrorism Financing and State Respons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34-151.

⑤ Yusri Hazran, "The Shiite Community in Lebanon: From Marginalization to Ascendancy," p. 4.

⑥ Ari Rabinovitch, "Israel's Barak Warns of Growing Hezbollah Arsenal," *Reuters*, September 10, 2008; David Schapiro and Katherine Zimmerman, "Estimates for Hezbollah's Arsenal," *Critical Threats*, June 29, 2010.

关系远远大于革命政权和其他境外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①总之，在伊朗的支持下，真主党的力量不断壮大。以色列媒体认为，从2006年到2016年，真主党武装力量从大约2万人增加到了4.5万（大约一半的战士是现役人员，一半是预备役）。^②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真主党与伊朗在地区事务特别是叙利亚危机中的合作，使双方的关系更具战略伙伴性质。真主党与伊朗共同支持巴沙尔政权，并于2013年参加叙利亚内战，“成为真主党—伊朗伙伴关系的另一里程碑”，而“真主党在叙利亚的军事活动极大增强了伊朗保护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能力”。^③真主党还在协助伊朗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朗还利用真主党成员的阿拉伯语优势帮助招募和训练打击“伊斯兰国”的阿拉伯武装人员。^④

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扶植的最成功的代理人，其原因复杂多样。从真主党方面看，真主党坚持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黎巴嫩教派分立的政治结构和国家政权脆弱、长期面临以色列的外来威胁，使真主党需要得到持续的外部支持；从伊朗方面看，从众多什叶派力量中选择并扶植意识形态接近的真主党、持续为真主党提供全方位支持、赋予真主党较大程度的自主权，是伊朗代理人策略得以成功的原因；从伊朗和真主党双方来看，双方彼此互有需求，双方围绕确立和巩固真主党的国内政治地位、对抗以色列、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打击“伊斯兰国”等事务进行长期合作，使双方能够长期维持、巩固和发展赞助—代理关系，并发展成为战略伙伴关系。在本质上，“支持真主党使伊朗能够确保一个可靠的、亲伊朗的组织对黎巴嫩产生重大影响”。^⑤在更具有象征意义的层面上，真主党的壮大代表着伊朗输出革命的最大成就。该组织在黎巴嫩的影响力为伊朗提供了声誉，同时也为伊朗的强硬派和理论家提供了成功素材。^⑥

① Ofira Seliktar, *Navigating Iran: From Carter to Obam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49.

② Amos Harel and Gili Cohen, “Hezbollah: From Terror Group to Army,” *Haaretz*, December 7, 2016.

③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p.28–29.

④ Ibid., p.29.

⑤ Ibid., p.30.

⑥ Frederic Wehrey, and Charles Wolf, *Understanding Iran*, p.86.

二、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关系：松散的赞助—代理关系

从地缘临近和国内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情况来看，伊拉克理应成为伊朗选择代理人的理想国度，但事实上伊朗却未能从伊拉克找到强有力的代理人。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尽管伊朗一直支持反对萨达姆政权的什叶派力量，但扶植代理人的成效并不理想。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对伊拉克代理人进行投资的机会才有所增加。^①伴随2011年美国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伊斯兰国”崛起导致伊拉克陷入严重动荡，伊朗在伊拉克寻找代理人的空间进一步扩大。在此背景下，早年与伊朗关系密切、由各种什叶派武装力量组成的“人民动员力量”（PMF），成为伊朗支持的主要代理人。但伊朗与“人民动员力量”等什叶派力量的关系基本上是松散的委托—代理关系，与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伊朗在伊拉克未能培养出类似真主党的代理人，其原因十分复杂。尽管伊拉克也存在众多不满现状的什叶派政治组织，但由于其分歧巨大，如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内部围绕是否把实行教法统治作为政治目标存在严重分歧，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真主党的主导力量。由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存在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矛盾，伊拉克什叶派尽管与伊朗存在共同的什叶派认同，但又多反对伊朗的外来干涉，抵制伊朗“输出革命”。总之，伊拉克什叶派力量复杂多样、意识形态分歧严重、对伊朗外来干涉存在抵触，都使伊朗无法找到一个能够整合伊拉克所有什叶派力量的宗教政治组织作为代理人，伊朗只能与众多什叶派政治组织保持松散的联系，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第一，在萨达姆政权时期，伊拉克政权的高压统治、两伊战争期间双方严重对抗、伊拉克什叶派多持反对伊朗的民族主义立场等，使伊朗难以找到合适的代理人，但伊朗仍支持了一些什叶派力量，并为后来选择和扶持代理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为“输出革命”和扶植代理人，于1981年成立了具有伞状组织结构特征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Islamic Revolutionary Council），其分支机构覆盖整个伊斯兰世界，其中的“伊拉克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The Supreme Islamic 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in Iraq）负责向伊拉

^① J. Matthew McInnis and Ashton Gilmore, *Iran at War: Understanding Why and How Tehran Uses Military Forc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December 2016, p. 18.

克输出革命。该组织与伊拉克的什叶派组织密切合作，开展反对萨达姆政权的活动。^①伊朗“输出革命”与伊拉克国内什叶派反对萨达姆政权的斗争具有一定和契合性，使伊朗与伊拉克的什叶派力量建立了联系。

首先，伊朗对历史悠久的伊拉克什叶派力量“达瓦党”（*Dawa*，原意为“宣教”，国内又译为召唤党、号召党或呼声党）有重要影响。达瓦党由伊拉克著名的萨德尔家族的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Muhammed Baqir al-Sadr, 1935–1980）于1958年创立，是中东历史上第一个什叶派伊斯兰政党。1980年4月，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因公开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被处死，但他的思想和活动推动了伊拉克什叶派的政治和宗教觉醒，他也被称为“伊拉克的霍梅尼”和萨德尔家族的“第一烈士”，受到伊拉克什叶派的普遍敬仰。20世纪80年代，由于萨达姆政权的镇压，达瓦党等什叶派政党被迫转移到伊朗。^②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该党才返回伊拉克，其领袖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于2005年当选为伊拉克总理。

其次，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为逃避萨达姆政权迫害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提供庇护，并派遣了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伊拉克为什叶派和库尔德武装提供训练。伊朗还为伊拉克什叶派的伊斯兰抵抗运动（Iraqi Islamic Resistance）提供支持，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与伊朗关系最密切的“人民动员力量”（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的指挥官多是当时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成员。^③

此外，成立于1982的“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the Islamic Supreme Council of Iraq）长期与伊朗保密切关系。该组织成立于两伊战争期间，其资助全部从伊朗获得。该委员会事实上是在伊朗支持下成立于德黑兰的流亡组织。在萨达姆统治期间，该委员会组建了地下民兵组织“巴达尔旅”（Badr Brigades），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其进行训练和武装。在两伊战争期间，“巴达尔旅”从伊朗对伊拉克南部发动数次攻击，主要针对伊拉克官员。1991年海湾战争末期，该组织发动了反对萨达姆的起义，但没有成功。^④

^① 参见王新中、冀开运：《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380–381页；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第334–335页。

^② T. M. Aziz, “The Role of Muhammad Baqir al-Sadr in Shi’i Political Activism in Iraq from 1958 to 198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25, No.2, 1993, pp.207–221；李福泉：《伊朗的萨德尔运动探微》，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6期，第36–37页。

^③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33.

^④ 岳汉景：《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评述》，载《国际展望》，2012年第4期，第119–120页。

第二,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特别是2011年美国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以及2014年“伊斯兰国”产生后,伊拉克因陷入严重动荡出现权力真空,什叶派武装崛起。伊朗通过参与打击“伊斯兰国”对伊拉克施加影响增强,进而使伊朗选择和扶植代理人的机会扩大。

随着萨达姆下台,被压制的伊拉克什叶派迅速崛起,这为伊朗为曾经被压制的什叶派团体提供支持提供了机会。美国解散伊拉克军队和“去复兴党化”(de-Baathification)的政策,也有利于伊朗对伊拉克施加影响。^①随着美国的占领引发了逊尼派叛乱,伊朗便抓住机会投资于打击逊尼派的什叶派民兵组织,并从中寻找代理人。^②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造成了新的权力真空,伊拉克陷入混乱,为伊朗寻找和扶植代理人创造了更多机会;2014年“伊斯兰国”产生后,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利于伊朗在伊拉克寻找代理人。在此背景下,伊拉克前总理努里·马利基领导的达瓦党、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领导的萨德尔派,以及主要的库尔德政党,均得到了伊朗的支持。在军事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IRGC-QF)及其指挥官卡西姆·莱曼尼(Qasem Soleimani)担任训练什叶派民兵组织的顾问。^③

总体而言,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在伊拉克的战略目标和制约因素都较为复杂。伊朗既不希望伊拉克再度强大进而对伊朗构成威胁,也不愿意伊拉克陷入严重动荡进而威胁伊朗的安全稳定,^④更不希望伊拉克成为美国威胁伊朗的前沿阵地。美国对伊拉克政治的主导、伊拉克分裂的教派和族群结构、什叶派内部的分裂、沙特和土耳其等地区国家对伊拉克的争夺,都对伊朗对伊拉克施加影响构成了制约。在此背景下,“代理人可以赋予伊朗在伊拉克境内的影响力,并帮助伊朗实现其目标”,但伊朗对伊拉克的政策显然并不是寻找和支持什叶派力量作为代理人,而是体现了较为务实的现实主

① Frederic Wehrey, David E. Thaler, Nora Bensahel, Kim Cragin, Jerrold D. Green, Dalia Dassa Kaye, Nadia Oweidat, and Jennifer J. Li, *Dangerous but Not Omnipotent: Exploring the Reach and Limitations of Iranian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09, p.143.

② Ray Takeyh, “Iran’s New Iraq,”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2, No. 1, 2008, p. 22.

③ Joseph Felter and Brian Fishman, *Iranian Strategy in Iraq: Politics and “Other Means,”*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 October 13, 2008, p.51. <https://ctc.usma.edu/app/uploads/2010/06/Iranian-Strategy-in-Iraq.pdf>.

④ Ray Takeyh, “Iran’s New Iraq,”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2, No. 1, 2008, p.23.

义和“机会主义”，甚至也在逊尼派中寻找投资对象。^①

伊朗在伊拉克的代理人策略明显不同于在黎巴嫩把真主党培养成唯一代理人并建立盟友关系的策略，而是根据伊拉克什叶派力量复杂多样、不断变化组合的特点，从政治和军事两个领域扶植代理人力量。

首先，在政治方面，伊朗通过整合伊拉克什叶派力量，对伊拉克政治施加影响。但由于什叶派力量的内部矛盾，伊朗难以在伊拉克打造出统一的亲伊朗什叶派政治力量，甚至要面对部分什叶派力量反对效仿伊朗教法学家统治、反对伊朗外来干预的现实，并迫使伊朗采取淡化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策略，在多种力量甚至是什叶派以外的力量中寻找代理人。

伊朗通过支持什叶派集团——伊拉克团结联盟（United Iraqi Alliance）在议会选举和政府组阁中取得优势，进而施加对伊拉克政府的影响。早期的伊拉克团结联盟基本上包括了几乎所有主要的什叶派派系，即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达瓦党以及由穆克塔达·萨德尔领导“萨德尔运动”。在2005年12月伊拉克的首次议会大选中，“伊拉克团结联盟”赢得275个议席中的128个，该联盟也因此政府在政府中占据优势，如达瓦党资深领袖努里·马利基当选总理，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和萨德尔运动获得多个部长职位等。^②

这里有必要集中介绍一下“萨德尔运动”。“萨德尔运动”与达瓦党均由什叶派家族萨德尔家族所创。在达瓦党的创立者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被萨达姆政权处死，达瓦党转入伊朗后，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的堂弟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Muhammed Sadiq al-Sadr, 1943-1999年）继续在伊拉克领导什叶派反对萨达姆政权的斗争，其领导的什叶派力量被称为“萨德尔运动”或“萨德尔力量”。在1999年萨迪克·萨德尔遭暗杀身亡后，其子穆克塔达·萨德尔继续领导该运动。在政治思想方面，萨德尔运动既坚持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伊斯兰主义路线，又坚持超越教派分歧的伊拉克民族主义，同时还坚持反美主义路线。在对待伊朗的态度上，既接受伊朗的支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又主张保持自身独立。^③

由此可见，伊拉克什叶派力量并非铁板一块，如果以其与伊朗的关系作为主要考察因素，其分歧对内主要是是否坚持效仿伊朗的教法学家治国伊斯

^①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33, pp.34-35.

^② 岳汉景：《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评述》，第119页。

^③ 李福泉：《伊朗的萨德尔运动探微》，第37-39页。

兰主义路线，对外主要围绕对美国、伊朗等外部力量干预的态度。上述分歧在达瓦党和“萨德尔运动”之间体现得较为明显。达瓦党尽管也反对美国干预，但基本上接受美国的政治安排，奉行联邦制、世俗化、民主化的政治路线，同时又无法排斥伊朗的影响。“萨德尔运动”坚持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伊斯兰主义路线，但同时坚持反对美国、伊朗干预的民族主义政策，并在后来脱离“伊拉克团结同盟”单独参加议会选举，且在2021年的议会大选中排名第一。^①因此，伊拉克什叶派难以形成持久统一的力量，伊朗也无法把其所期望的政策结果强加给伊拉克。^②在此背景下，伊朗不仅要与什叶派保持灵活的关系，而且还支持伊朗的逊尼派、库尔德力量。总之，“意识形态上的亲和性并不是伊朗选择代理人的绝对先决条件”^③。伊朗只能“尽可能多地支持不同的伊拉克组织……最大限度地创造机会，即不管何种力量在伊拉克获得权力，伊朗都能够与其建立合作关系”^④。

其次，在军事方面，伊朗主要是利用打击“伊斯兰国”的机会，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把大量的什叶派准军事组织和民兵组织聚集在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的旗帜下，但同样也无法回避“人民动员力量”内部各什叶派武装之间的分歧，并采取灵活务实的代理人策略。

根据相关研究报告，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由67个民兵组织组成，其中大约40个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有密切联系，其中受伊朗影响较大的组织包括正义联盟(Asa'ib Ahl al-Haq)、巴达尔组织(the Badr Organization)和真主党旅(Kata'ib Hizballah)。^⑤这40多个民兵组织对伊朗的忠诚程度差别很大，但与伊朗关系最牢固的民兵组织往往是倾向于支持效仿伊朗教法学家统治的团体，并承认伊朗最高领袖也是他们自己的宗教领

① “萨德尔运动”获73个席位；前总理马利基领导的“法治国家联盟”获37席，排名第三；逊尼派政治团体“进步联盟”获38席，位列第二。《伊拉克大选，“反美派”赢最多席位，获得优先组阁权》，载《环球时报》，2021年10月13日。

② 岳汉景：《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评述》，第124页。

③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33, p.35.

④ Frederic Wehrey, et al, *Dangerous but Not Omnipotent: Exploring the Reach and Limitations of Iranian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p.106.

⑤ Nicholas A. Heras, *Iraq's Fifth Column: Iran's Proxy Network*, Washington, D.C.: Middle East Institute, Policy Paper, October 2017, p.2. https://www.mei.ed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PP2_Heras_IraqCT_0.pdf.

袖。^① 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的意识形态矛盾也渗透到了军事组织“人民动员力量”内部，其分歧与政治组织的分歧重合，主要包括是否支持在伊拉克实行效仿伊朗的教法学家统治，以及接受或反对伊朗介入伊拉克事务。^②

针对“人民动员力量”的内部分歧，伊朗仍采取务实的策略，并不介入其内部矛盾纷争，而是尽可能多地支持愿意接受伊朗资助的军事组织。2016年11月，“人民动员力量”根据法律被纳入伊拉克安全部队，进而赋予其在击败“伊斯兰国”之后持久存在的合法性。这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动员力量”对伊朗的潜在价值，因为它为伊朗对伊拉克安全部队施加影响提供了渠道。^③

综上所述，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的赞助—代理关系具有多元松散、灵活务实的特点，其具体表现和原因包括：

第一，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围绕是否实行效仿伊朗的教法学家统治存在分歧，伊朗尽管注意不同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的意识形态取向，但并不刻意以意识形态划线寻找和支持代理人。伊朗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恰如伊拉克的一位什叶派议员所言：“伊拉克和伊朗什叶派之间有许多差异：我们想要民主，他们要伊斯兰统治”。^④ 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⑤曾明确指出“我绝不允许伊朗的经验在伊拉克被复制”。^⑥ 其原因在于西斯塔尼虽然出生在伊朗，但他的治国理念与伊朗明显不同。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奉行政治行动主义，主张实施教法学家治国，并建立伊斯兰政权；西斯塔尼则不主张参与政治，但主张宗教学者（乌莱玛）在社会和法律

^① Gawdat Bahgat,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Emerging Security Paradigm in the Middle East,” *Parameters*, Summer 2007, p. 11.

^②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38.

^③ Rowan Scarborough, “Iran Positioning Shiite Militias in Iraq as Regional Expeditionary Force,” *Washington Times*, November 21, 2016.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6/nov/21/iran-positioning-shiite-militias-in-iraq-as-region/>

^④ Liz Sly, “Iranian Influence Soaring in Iraq,” March 8, 2007, http://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2007-03-08/news/0703080164_1_shiite-rule-arab-iraq-vali-nasr.

^⑤ 西斯塔尼是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他以其在伊拉克政府、什叶派各派力量、美国、伊朗之间的协调平衡能力而著称，关于其政治思想可参见赵建明：《西斯塔尼的什叶派构想及其对伊拉克国家构建的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4期，第123-130页。

^⑥ Maximilian Terhalle, “Are the Shia Rising?” *Middle East Policy*, Vol. 14, No. 2, 2007, p.77.

领域发挥积极作用。^①

第二，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存在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伊拉克与伊朗的历史夙怨，使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对伊朗的干预存在反对、抵触、反感、猜忌等不同态度和心里，使伊朗无法在伊拉克打造出高度统一并效忠伊朗的政治和军事代理人。这也恰如有关评价所言：“伊朗对一些人影响力，但对其他人没有。多数什叶派教徒不支持伊朗政权，而且他们不是波斯人。在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有很深的敌意”。^②

第三，伊朗在伊拉克的代理人策略是投资任何愿意接受其财政和物资支持的伊拉克组织。这一战略尽管存在风险，但能够使伊朗广泛参与伊拉克事务，同时避免在伊拉克未来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选择赢家或输家，同时也可以逃避伊拉克内部的政治分歧。^③这一战略使伊朗能够拥有广泛的、具有不同能力和优势的客户。^④

三、伊朗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建构中的赞助—代理关系

国内外学界在分析2011年以来的也门内战时，人们多把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竞争视为也门内战的根源之一，即沙特支持也门政府，伊朗支持什叶派胡塞武装。但如果历史地、客观地来看，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并非典型的赞助—代理关系，尤其是双方的关系并非从胡塞武装产生起就具有赞助—代理关系的性质。因为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胡塞武装便与伊朗建立了联系，西方也指控伊朗至少从2009年起就向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持，但直到2011年，几乎没有公开证据表明伊朗为胡塞武装提供直接支持。^⑤直到2011年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政权在“阿拉伯之春”中倒台，特别是2015年沙特领导阿拉伯联军打击胡塞武装后，胡塞武装对伊朗的

^① Babak Rahimi, "Ayatollah Ali Al-Sistani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Post-Saddam Iraq,"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 No. 4, 2004, p.14.

^② Liz Sly, "Iranian Influence Soaring in Iraq".

^③ Frederic Wehrey, et al, *Dangerous but Not Omnipotent: Exploring the Reach and Limitations of Iranian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2009, p.105.

^④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36.

^⑤ Ibid., p.51.

价值才开始上升；在沙特和也门政府打击下，胡塞武装对伊朗的需求也开始上升。在此背景下，双方的合作水平才得到提升，但双方并未形成典型的赞助—代理关系，其重要原因在于双方的意识形态基础薄弱、胡塞武装的独立性较强、伊朗仍在进行战略评估以及其他复杂因素的制约。因此，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关系属于仍在建构中的赞助—代理关系。

（一）伊朗与胡塞武装并不存在赞助—代理关系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

从20世纪90年代胡塞运动兴起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导致萨利赫政权倒台，胡塞武装虽受到伊朗影响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双方的关系并不属于赞助—代理关系。

胡塞武装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也门宰德派复兴运动中建立的宗教政治组织。分布在也门北部的宰德派也称第五伊玛目^①派，创立者为什叶派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②的孙子宰德·本·阿里。^③宰德派约占也门人口的35%-45%。^④在7世纪也门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并伊斯兰化以后，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及一系列地方王朝先后统治也门。16世纪至20世纪初，也门大部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南部沿海地区相继遭到葡萄牙和英国的侵略。1918年奥斯曼帝国崩溃，宰德派伊玛目叶海亚领导建立了独立的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在1962年也门军官革命推翻伊玛目政权、建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北也门）后，宰德派在政治上经济处于边缘地位，^⑤沙特瓦哈比派宗教扩张的冲击，伊斯兰复兴特别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共同推动了宰德派复兴运动的产生。^⑥

① “伊玛目”为阿拉伯语音译，意为“领拜人”“表率”“率领者”，原指清真寺内率领穆斯林群众举行拜功的领拜师。什叶派强调伊玛目是伊斯兰教地位最高的领导人，即宗教领袖。在逊尼派中，伊玛目一词没有宗教领袖的含义，多指教义学、教学法、圣训学、经注学等领域的高级学者，以及各伊斯兰教学派的思想、理论奠基人。

② 侯赛因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第四任正统哈里发阿里的次子。

③ Vali Nasr, *The Shia Revival: How Conflicts within Islam will Shape the Futur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6, pp.75-77.

④ Stephen W. Day, *Regionalism and Rebellion in Yemen: A Troubled National U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1.

⑤ Lisa Wedeen, *Peripheral Visions: Publics, Power and Performance in Yeme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 153.

⑥ 详尽论述参见吴天雨、吴冰冰：《也门宰德派的兴衰与胡塞武装的政治抗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3期，第52-53页。

胡塞运动是宰德派复兴运动的产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排斥瓦哈比派的影响,也门著名宰德派领袖阿拉玛·赛义德·胡塞(Alama Said Houthi)呼吁复兴宰德派。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的影响下,阿拉玛·赛义德·胡塞(Said Hussein Husthi)之子赛义德·侯赛因·胡塞建立了宰德派的政治组织——青年信仰者组织(*Hizb al-Haqq*)。^①1992年,同为栽德教派成员的也门总统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联合“青年信仰者”组织对抗逊尼派,^②使侯赛因·胡塞的势力不断壮大;1993年,侯赛因·胡塞当选为议员,主张在也门建立伊斯兰神权统治,并与萨利赫政权产生矛盾。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侯赛因·胡塞及其支持者将矛头指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指责萨利赫政权是美国的走狗。2004年,宰德派宣布在萨达省建立伊斯兰政府,遭到也门萨利赫政权的重兵围剿,侯赛因·胡塞被政府军击毙,但其反政府活动从未中断。^③侯赛因·胡塞死后,其支持者将青年信仰者组织更名为“胡塞人”,外界多称其为胡塞武装或胡塞运动。从2004年到2010年,在胡塞武装与也门萨利赫政权长达七年的冲突中,萨利赫政权得到了沙特的支持。

从20世纪90年代“胡塞运动”兴起到2011年萨利赫政权倒台前,胡塞武装的建立及主要创始人都受到了伊朗的影响,并与伊朗建立了联系。但如果以赞助—代理关系的要素即物质支持、持久合作、共同敌人三大因素来衡量,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并不具备这三大要素,双方的关系因而也并不属于赞助—代理关系。

首先,胡塞武装并未得到包括伊朗的大量物质支持。在与也门政府长达七年的对抗中,“胡塞武装是在几乎没有任何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在对抗也门和沙特政府持续压力的经历中形成的”,并发展成为“真正具有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且能力超群的武装力量”^④。

其次,胡塞武装与伊朗存在联系,但并未形成持久的合作。在20世纪90

① Barak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Wells,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 The Houthi Phenomenon*,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10, p.95.

② Victoria Clark, *Yemen: Dancing on the Heads of Snak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49.

③ 详尽论述参见吴天雨、吴冰冰:《也门宰德派的兴衰与胡塞武装的政治抗争》,第55—56页。

④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p.55—56.

年代，胡塞武装便与伊朗建立了联系，^①胡塞父子都有到伊朗库姆学习或旅居伊朗的经历。^②在上世纪90年代末，侯赛因·胡塞曾前往伊朗和苏丹学习宗教。^③由于很多国家的什叶派精英都有伊朗学习的经历，这种联系并非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合作关系。

最后，伊朗和胡塞武装尚缺乏较为明确的共同敌人。尽管胡塞武装提出了“真主伟大，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诅咒犹太人，伊斯兰教胜利”^④的组织口号，并与伊朗反美、反以的政策主张有一定的契合性，但美国和以色列主要是胡塞武装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并非胡塞武装和伊朗在现实中共同反对的敌人，双方尤其还没有把沙特作为共同的敌人并合作予以打击。

（二）伊朗和胡塞武装建构赞助—代理关系的时期，但仍存在不确定性（2011年以来）

2011年萨利赫政权倒台后，胡塞武装在也门政治转型和内战过程中不断壮大，对伊朗的战略价值明显增强。2015年以来沙特与伊朗矛盾加剧并于2016年断交，沙特领导阿拉伯联军打击胡塞武装，使伊朗和胡塞武装对彼此的战略需求增强。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关系仍处于建构赞助—代理关系的过程之中，尚未形成稳固、持久的赞助—代理关系并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第一，伊朗和胡塞武装建立赞助—代理关系的条件初步具备，彼此的相互需求上升。

首先，沙特介入也门冲突，萨利赫政权为争取沙特增加支持，把胡塞武装塑造为伊朗在也门的代理人，使沙特和伊朗作为也门冲突双方赞助者的话语开始出现。在2004—2010年胡塞武装与也门萨利赫政权的对抗中，沙特是影响也门政局的重要因素。因为沙特支持的瓦哈比派扩张是宰德派寻求复兴和胡塞武装建立的重要原因，沙特自然是胡塞武装反对的对象；胡塞武装与萨利赫政权的冲突波及也门和沙特边境，以及“基地”组织从也门威胁沙特，

^① Juneau, Thomas, "Iran's Policy toward the Houthis in Yemen: A Limited Return on a Modes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 3, 2016, p. 655.

^② Barak Salmoni, Bryce Loidolt, and Madeleine Wells, *Regime and Periphery in Northern Yemen: The Huthi Phenomenon*, p.98.

^③ Peter Salisbury, *Yemen and the Saudi-Iranian "Cold War,"* London: Chatham Hous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5, p.5.

^④ Victoria Clark, *Yemen: Dancing on the Heads of Snakes* p.250.

都促使沙特和也门日益加强共同打击胡塞武装和“基地”组织的合作。这促使胡塞武装开始把沙特作为攻击对象，导致胡塞武装越过边境进入沙特阿拉伯，并于2009年11月与沙特边防部队发生冲突，^①双方的冲突持续到2010年1月才达成脆弱的停火协议。^②而萨利赫政权更是极力把打击胡塞武装的行为塑造为打击伊朗代理人的斗争，指责伊朗为胡塞武装提供武装和训练。分析多认为，也门之所以渲染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旨在争取沙特和美国的支持。^③

其次，“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也门萨利赫政权的崩溃、沙特和伊朗对抗的加剧，使胡塞武装和伊朗对彼此的价值和需求增加，双方建立赞助—代理关系的条件初步具备。

从也门形势来看，2011年的民众抗议和胡塞武装的反叛运动导致也门陷入动荡，萨利赫政权在2012年和平交权并组建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Abdrabbuh Mansur Hadi）任总统的过渡政府。2014年“全国对话大会”（the National Dialogue Conference）召开，但未能解决也门政治转型的矛盾，胡塞武装和南方分离主义运动拒绝接受大会的协议，导致也门陷入内战。2015年3月，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空袭，胡塞武装面临的军事压力加大，进而使其对外部支持的需求扩大。因此，也门的动荡局势尤其是内战的爆发，使伊朗可以更容易进入也门寻找代理人，而2011年至2015年胡塞武装在军事能力、领土控制范围和政治权力方面都有了显著增长，^④也使其作为潜在代理人拥有更重要的战略价值。

从地区层面，沙特与伊朗对抗加剧，双方在地区范围内广泛进行代理人争夺，沙特扶植哈迪政权并打击胡塞武装，使伊朗扶植胡塞武装并与沙特展开代理人战争的条件初步具备。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沙特与伊朗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矛盾和教派矛盾相交织，^⑤使双方在叙利亚、伊拉克、巴林

① Robert F. Worth, “Yemeni Rebels and Saudis Clash at Borde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 2009.

② Marieke Brandt, “Sufyān’s ‘Hybrid’ War: Tribal Politics during the H.ūthī Conflict,” *Journal of Arabian Studies*, Vol. 3, No. 1, 2013, p. 131.

③ Peter Salisbury, *Yemen: Stemming the Rise of a Chaos State*, p. 23; Terrill, W. Andrew, “Iranian Involvement in Yemen,” *Orbis*, Vol. 58, No. 3, 2014, pp. 437–439.

④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57.

⑤ 参见刘中民：《中东地区格局的冷战化趋势及其影响》，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2期第15–17页。

的教派矛盾和权力竞争加剧，特别是2015年萨勒曼任沙特国王以来，采取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并于2016年与伊朗断交，这都使也门胡塞武装成为伊朗代理人的现实可能性不断扩大。

有分析认为，伊朗在2011年即使是向胡塞武装提供过支持，也是有限的低成本、低风险的支持。^①在2010年之前，伊朗媒体很少评论也门危机，并坚决否认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援助。但伴随沙特与伊朗对抗的加剧，伊朗媒体开始越来越多地谴责沙特在也门从事反对什叶派的活动，并把它描述为攻击什叶派世界活动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伊朗开始为干预也门冲突和支持胡塞武装获得公众支持。^②

第二，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关系仍处在建构赞助—代理关系的过程之中。

由于也门冲突严重导致信息不足，使得外界很难获取关于伊朗和胡塞武装合作内容及程度的信息资料。总体来说，伊朗明确对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并提升水平，与伊朗和沙特对抗的公开化和尖锐化存在同步性。具体表现为伊朗对沙特军事干预也门的强烈谴责，并把沙特出兵也门与逊尼派对抗什叶派的教派矛盾联系在一起，同时在舆论上公开支持胡塞武装。足见利用胡塞武装抗衡、袭扰和牵制沙特，是胡塞武装对于伊朗最大的潜在代理人价值。胡塞武装与沙特在也门境内的冲突可以对沙特构成牵制，而伊朗又无需卷入冲突。总之，“伊朗仅付出相对较低的成本，便可使沙特军队付出高成本，而伊朗并没有直接和沙特对抗的风险。”^③此外，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控制大片领土，使胡塞武装有可能成为伊朗接近沙特，并对沙特构成直接威胁的代理人。^④对于胡塞武装来说，在2015年遭到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的军事打击后，获得伊朗支持对其维持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胡塞武装也希望借助伊朗的支持，抵制和清除沙特萨拉菲派在也门北部的影响。^⑤

从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东政治、也门冲突、伊朗外交、胡塞武装研究

① Peter Salisbury, *Yemen: National Chaos, Local Order*, London: Chatham Hous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p.32.

②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63.

③ Ibid., p.64.

④ “Yemen Rebel Missile Shot Down 200km from Saudi Capital,” *Al Jazeera*, May 19, 2017.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7/05/yemen-rebel-missile-shot-200km-saudi-capital -170520020737152.html>.

⑤ Thomas Juneau “Iran’s Policy toward the Houthis in Yemen: A Limited Return on a Modest Investment,” p.651.

的大量学术成果、智库研究报告和媒体报道来看，各种成果都承认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且在2015年以后有明显增长。但对于伊朗对胡塞武装支持的规模、程度，以及双方关系的性质，学界存在较大的分歧。关于支持规模和程度，有的观点特别是西方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多认为伊朗在资金、物资、武器、培训方面为胡塞武装提供了大力支持；有的观点则认为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较为有限；关于伊朗和胡塞武装关系的性质，学界存在利益交换、政治结盟、教派联盟、赞助—代理关系等多种看法。^①

客观而言，2015年以来伊朗对胡塞武装支持的规模和水平明显提高符合事实，这在伊朗自身的官方立场和媒体报道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甚至在联合国关于也门的报告中也有一定的体现。^②但关于支持的具体情况尤其是武器、资金和培训等情况，缺乏翔实可信的数据佐证，特别是西方的大量报告和报道中的数据多具有不确定和推断、猜测等问题的存在。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在2011—2014年，即也门陷入内战和胡塞武装力量明显壮大前，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相当有限；2015年以后伊朗的支持开始增加，但这种支持的确切性质和程度仍不清楚。^③这应是较为客观的看法。

第三，伊朗和胡塞武装并未形成持久、可持续的赞助—代理关系，双方关系的未来尚存在不确定性。

从赞助—代理关系的角度看，本文认为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关系尚处在赞助—代理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其关系具备了赞助—代理关系的某些特征，即赞助方对代理方的支持、双方对抗沙特的共同目标。但双方合作的性质尚不具备赞助—代理关系特征中的持久性，双方关系更多还是交易性质的关系，双方的目标也还存在一定差异，胡塞武装较强的自主性也使伊朗对其的领导能力较为有限。

首先，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关系更多是机会主义的利益交换，双方的合作缺乏战略性。“长期以来伊朗在也门的利益是非常有限的”，^④特别是在2011

① 相关的讨论可参见：武星艳：《伊朗与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关系探析》，载《国际研究参考》，2016年第3期，第14—22页；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p.63—71。

②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Final Report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on Yemen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Resolution 2140*,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7, p.159.

③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64.

④ Thomas Juneau, “Iran’s Failed Foreign Policy: Dealing from a Position of Weakness,” <http://www.mei.edu/content/article/iran%E2%80%99s-failed-foreign-policy-dealing-position-weaknes>.

年以前，伊朗并不认为其在也门拥有巨大的战略利益。有分析认为，伊朗在也门的利益是间接的、非核心的，它向宰德派和胡塞武装组织提供的支持也是有限的、机会主义的；^①即使在2015年胡塞武装遭受打击以来，“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仍然主要是交易性的，双方只在战略和战术价值大于成本的情况下履行承诺”。^②

其次，伊朗并未拥有对胡塞武装的领导能力，胡塞武装的意识形态和发展目标都有较强的自主性。胡塞武装在性质上是代表也门北部宰德派利益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在2004年开始与也门政权发生冲突后已具有反叛武装的性质，但其并未封闭与也门政权和解的大门，并参加了2014年的“全国对话大会”，只是在大会协议未能满足其要求后转向武装抗争。然而，胡塞武装作为也门地方性政治组织的性质并未改变，其主要诉求是结束宰德派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边缘化，其与沙特的冲突也并非听命于伊朗的结果，而是力图清除沙特在传统宰德派地区的影响。总之，“胡塞武装最终是一个也门本土的组织，其自治的领导层几乎完全受也门当地的问题驱动。”^③自成立以来，胡塞武装一直关注也门当地问题，而不是参与伊朗更广泛的地区战略。“胡塞武装和伊朗领导人的利益和目标不能在所有问题上保持一致。虽然胡塞有共同的敌人（沙特），但胡塞传统上关注他们的国内利益，而且远不如伊朗的其他一些代理人更倾向于输出革命的热情。”^④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几乎无法直接控制胡塞武装的行为和决策。”^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曾表示，尽管美国的确担心伊朗与胡塞武装组织的关系，但没有证据表明伊朗控制胡塞武装组织的行动。^⑥

最后，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缺乏牢固的意识形态根基。如前所述，在宗教信仰方面，胡塞武装信奉什叶派宰德派，伊朗信奉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

① 武星艳：《伊朗与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关系探析》，第14页。

②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64.

③ Adam Baron, *Civil War in Yemen: Imminent and Avoidable*, Lond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5, p.5.

④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80, p.70, p.64.

⑤ Ibid.

⑥ Mohsen Milani, “Iran’s Game in Yemen,”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ran/2015-04-19/irans-game-yemen>.

尽管胡塞武装赞赏和肯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双方也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宗教联系，^①但双方无论是在教派认同，还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并未形成牢固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在教派方面，宰德派在信仰方面与逊尼派更为接近；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胡塞武装虽对霍梅尼伊斯兰革命的精神大加赞扬，但其与伊朗十二伊玛目派的伊斯兰主义（Twelver Islamism）理论及其“教法治国原则”（*velayat-e faqih*）的联系较弱，与伊朗和其他代理人的关系相比，伊朗与胡塞武装的联盟更多依靠共同利益。^②

综上所述，在胡塞武装建立和发展的早期即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胡塞武装的建立受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双方的宗教联系也较为广泛，但二者并未建立赞助—代理关系；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也门国内和地区形势变化使伊朗和胡塞武装对对方的需求上升，双方进入建构赞助—代理关系的时期，但双方的关系仍缺乏战略性、持续性和意识形态根基，其未来尚具有不确定性，双方关系的未来取决于胡塞武装在也门的政治地位、也门形势和地区形势走势、伊朗的选择等多重因素。

四、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关系： 失败的赞助—代理关系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由于霍梅尼坚持输出革命、反对海湾国家君主制等思想，^③以及海湾的沙特、科威特、巴林存在一定数量在政治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什叶派，海湾阿拉伯国家曾经是伊朗输出革命的对象，并把支持什叶派政治反对派组织作为向海湾国家渗透的手段。但由于海湾阿拉伯国家政权较为稳固，安全控制能力较强，伊朗支持下的什叶派政治组织或者遭打击而趋于消失，或者与政权和解放斗争。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朗通过支持海湾国家什叶派政治组织输出革命，并寻求代理人的活动基本以失败而告终。

① 参见武星艳：《伊朗与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关系探析》，第16—18页。

②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78.

③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85—89页。

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巴林再度出现什叶派政治反对派反对逊尼派王室的民众抗议浪潮，并受到沙特与伊朗竞争的影响。巴林逊尼派政权和什叶派反对派的斗争也被外界视为沙特和伊朗代理人竞争的一部分。但由于沙特以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名义出兵对巴林什叶派抗议进行镇压，以及伊朗对巴林什叶派的实际支持有限，巴林民众抗议浪潮最终以失败告终。^①因此，在2011年巴林抗议浪潮中，伊朗仍然未能培育出代理人并建立赞助—代理关系。

相对于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成功建立和保持具有战略同盟性质的赞助—代理关系，以及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也门胡塞武装初步建立赞助—代理关系，伊朗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建立赞助—代理关系的努力可谓收获甚微。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从本文提出的关于建立赞助—代理关系条件的假设来看，海湾阿拉伯国家除存在什叶派反对派组织的条件外，不存在国家脆弱、外部干预等条件，而海湾国家的“强国家”、海湾合作委员会的集体安全机制、美国的安全庇护都构成了伊朗实施代理人策略的巨大阻碍。由于海湾六国中什叶派占一定数量的主要是沙特、巴林、科威特三国，下文主要集合它们进行分析。

第一，海湾阿拉伯国家沙特、巴林、科威特都程度不等地拥有处于边缘地位、对现状不满的什叶派及其政治反对派组织，使伊朗在这些国家存在建立赞助—代理关系的可能。

沙特阿拉伯什叶派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15%，^②集中在濒临波斯湾的东部省份，长期在沙特政治经济中处于边缘地位。在宗教上，在沙特的瓦哈比派看来，什叶派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都不符合伊斯兰教的精神，什叶派信徒的穆斯林身份也从未得到正式承认，其宗教生活、清真寺修建、宗教教育机构的发展均受到严格的限制。^③“由于没有和其他瓦哈比派国民平等的地位，什叶派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领域都处于边缘地位。”^④

^①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试析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以巴林问题为案例的分析》，第139–147页。

^② Toby Matthiesen, “A ‘Saudi Spring?’: The Shi’a Protest Movement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2011–2012,”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6, No. 4, 2012, p.630.

^③ Frederic Wehrey, *The Forgotten Uprising in Eastern Saudi Arabia*,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3, p.5.

^④ 王宇洁：《什叶派：历史、思想与现实》，第222页。

巴林的什叶派占人口占绝对多数，其比例约为70%，^①但政权长期掌握在逊尼派王室手中^②。自3世纪到19世纪，巴林曾相继处于波斯附属国希拉王国、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波斯萨法维王朝（期间什叶派居主导地位）、逊尼派哈利法家族（逊尼派居于主导地位）和英国的统治之下，什叶派和逊尼派都曾经占主导地位。^③但自1783年逊尼派哈利法家族确立对巴林的统治后，逊尼派成为巴林的统治阶层并一直延续至今。^④哈利法家族在宗教上受沙特瓦哈比派影响较深，对什叶派总体上持排斥和不信任态度；什叶派在政治上也遭到排斥，^⑤政府部门的职位特别是雇佣人数最多内务部和安全部，什叶派都没有机会进入；政府在土地使用、住房等社会生活方面采取的限制性措施，进一步造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区隔。^⑥

科威特什叶派占人口的比例约为30%，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关系相对较好，双方享受的公民待遇大致相当，^⑦但什叶派的地位仍低于逊尼派，很少能在外交部门或国防机构担任重要职位。^⑧

总之，“什叶派社区在海湾地区的边缘化地位为伊朗提供了一个明显的机会”。^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显然吸引了海湾地区的许多什叶派，并为这些社区提供了一种替代现状和结束长期边缘化处境的前景。”^⑩鉴于海湾国家靠近伊朗，及其在能源、海洋通道方面的战略价值，一旦成功扶植代理

① Joseph Kostiner, “Shi’i in the Gulf,” in Martin Kramer, ed., *Shi’ism,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7, p.173.

② 吴冰冰：《中东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新变化》，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5期，第42页。

③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03-304页。

④ Graham Fuller, and Rend Rahim Francke, *The Arab Shi’a: The Forgotten Muslim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121.

⑤ Joseph Kostiner, “Shi’i in the Gulf,” in Martin Kramer, ed., *Shi’ism,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p.175.

⑥ 王宇洁：《什叶派：历史、思想与现实》，第237页。

⑦ Robert Hatem and Derek Gildea, *Kurwaiti Shia: Government Policies, Societal Cleavages, and the Non-Factor of Ira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2011, p. 6, pp11-14.

⑧ Joseph Kostiner, “Shi’i in the Gulf,” in Martin Kramer, ed., *Shi’ism,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p.175.

⑨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p.43-44.

⑩ Ibid.

人，“将在战略和经济利益方面对伊朗有的特殊的价值”。^①

第二，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在伊朗的影响和支持下，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什叶派政治组织，但海湾君主制国家威权统治下的“强国家”属性，使国家政权拥有镇压和融合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强大能力，构成了阻碍或瓦解伊朗推行代理人策略的强大后盾。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开始在思想宣传和组织建设方面加强向海湾国家输出革命，而对现状不满的什叶派及其政治组织是伊朗影响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重要抓手。例如，利用海湾地区的清真寺和什叶派神职人员扩大影响力，^②对经过选择和培养的什叶派神职人员进行“高度政治化的宣教”（highly politicized preaching）；^③利用德黑兰电台加强对海湾国家的广播宣传，^④都是伊朗所采取的措施。

为加强组织统筹，伊朗于1981年成立了具有伞状组织结构特征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Islamic Revolutionary Council），下辖五个分支机构，它们分别是“伊拉克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The Supreme Islamic 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in Iraq）“黎巴嫩伊斯兰革命协会”（The Islamic 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in Lebanon）“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协会”（The Islamic 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in the Arab Peninsula）“非洲和马格里布伊斯兰革命协会”（The Islamic 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in Africa and Maghreb）“亚洲伊斯兰革命协会”（The Islamic 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in the Asia），其中“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协会”负责领导沙特、科威特、巴林等海湾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尤其是什叶派组织的活动，这些国家的什叶派政治反对派都加入了该组织，并接受伊朗的领导和培训。^⑤

在沙特，伊朗最初支持的是受伊朗革命影响建立的“阿拉伯半岛伊斯兰

①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p.43-44.

② Robin Wright, *Sacred Rage: The Wrath of Militant Isla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5, p.126.

③ Joseph Kostiner, “Shi’i in the Gulf,” in Martin Kramer, ed., *Shi’ism,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pp.177-178.

④ Hasan Tariq Alhasan, “The Role of Iran in the Failed Coup of 1981: The IFLB in Bahrai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5, No. 4, 2011, pp.606-607.

⑤ 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第334-335页。

革命组织”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the Arab Peninsula)。^①但是,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被沙特政府软化,并放弃与沙特政府的军事对抗后,伊朗又转向支持“希贾兹真主党”(Hizballah al-Hijaz)。该组织是流亡伊朗的沙特什叶派神职人员领导建立的组织,^②伊朗也发现该组织“更具战斗性”。^③沙特的各种什叶派政治组织也进行了包括争取权利、示威游行、暴力活动等各种政治抗争。面对伊朗支持下的什叶派政治组织的挑战,沙特采取了严厉镇压、安全管控、政治与经济社会改革、宗教对话等各种软硬兼施的对策。^④尽管“希贾兹真主党”等有伊朗背景的什叶派政治组织仍未放弃推翻沙特政权的态度,但并未成为能对沙特构成严重威胁的伊朗代理人。

在巴林,“巴林伊斯兰解放阵线”(the Islam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Bahrain, IFLB)是在伊朗革命影响下建立的最具代表性的什叶派政治组织。^⑤该组织以清真寺和什叶派宗教机构为基地进行政治动员,^⑥同时明确支持伊朗的霍梅尼主义,主张在巴林进行“伊斯兰革命”。^⑦此外,伊朗和巴林什叶派在宗教方面的联系也日趋密切,不断有巴林什叶派人士前往伊朗宗教圣城库姆学习。^⑧1981年12月,“巴林伊斯兰解放阵线”利用在伊朗受训的人员策划政变,但被巴林政府挫败而未能成功。至上世纪末,在巴林政府的打击下,总部设在伊朗的“巴林伊斯兰解放阵线”在巴林国内的影响已经相当有限。^⑨

① Toby Craig Jones, “Rebellion on the Saudi Periphery: Modernity, Marginalization, and the Shi’a Uprising of 197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8, No. 2, 2006, p.215.

② Toby Matthiesen, “Hizbullah al-Hijaz: A History of the Most Radical Saudi Shi’a Opposition Group,”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4, No. 2, Spring 2010, p.180.

③ Ibid, pp.182–183. Frederic Wehrey, *The Forgotten Uprising in Eastern Saudi Arabia*,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3, p.6

④ 王宇洁:《什叶派:历史、思想与现实》,第222–229页。

⑤ Geneive Abdo, *The New Sectarianism: 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Shi’a - Sunni Divid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3, p.10.

⑥ Robin Wright, *Sacred Rage: The Wrath of Militant Islam*, p. 117.

⑦ Hasan Tariq Alhasan, “The Role of Iran in the Failed Coup of 1981: The IFLB in Bahrai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5, No. 4, Autumn 2011, pp. 607–608.

⑧ Luayy Bahri, “The Soci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the Shiite Opposition in Bahrain,”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11, No.3, 2000, p.131.

⑨ Graham Fuller, and Rend Rahim Francke, *The Arab Shi’a: The Forgotten Muslim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p.126–127; Joseph Kostiner, “Shi’i in the Gulf,” in Martin Kramer, ed., *Shi’ism,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p. 180.

在科威特，由于什叶派的权利待遇较好，并没有产生典型的什叶派政治组织。其受到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来自黎巴嫩、伊拉克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什叶派激进组织，如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 Group）、阿拉伯革命旅（Arab Revolutionary Brigades）、希贾兹圣战组织（the Holy War Organization in the Hijaz）、正义士兵（the Soldiers of Justice）制造的暴力袭击事件。^①最典型的事件是1984年一架飞往德黑兰的科威特飞机遭劫持。^②此外，在1989年发生的袭击麦加大清真寺（the Great Mosque in Mecca）未遂事件中，发现了名为“科威特真主党（Hizballah Kuwaiti）的组织，但该组织没有任何其他的已知信息。^③总之，尽管在科威特发生了一些暴力袭击事件，但这些组织“没有一个成为伊朗的真正合作伙伴，它们的价值被证明是短暂的”^④，不仅“没有给伊朗产生持久的战略价值，实际上成为被海湾国家当局利用来镇压什叶派激进主义的理由”^⑤。

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中存在着诸多被称为“真主党”的组织，如“科威特真主党”“巴林真主党”，都是海湾国家对一些亲伊朗派系的称谓，但它们与伊朗的关系相当薄弱甚至并不存在。例如，巴林政府用“巴林真主党”来指代“与伊朗关系密切、致力于恐怖主义行动的巴林什叶派”，^⑥但它们可能根本没有得到伊朗的任何直接支持。在科威特也有类似现象，什叶派被描述为“与伊朗关系密切的秘密的小型真主党网络”，其特征是这些什叶派人士经常前往伊朗，并与伊朗的宗教和政治权威中心存在良好的关系。^⑦阿联酋也指责得到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潜伏组织”，但事实上阿联酋并无什叶派政治组织活动的历史。^⑧

① Joseph Kostiner, “Shi’i in the Gulf,” in Martin Kramer, ed., *Shi’ism,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p. 181; Toby Matthiesen, “Hizballah al-Hijaz: A History of the Most Radical Saudi Shi’a Opposition Group,”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4, No. 2, 2010, p.187.

② Joseph Kostiner, “Shi’i in the Gulf,” in Martin Kramer, ed., *Shi’ism,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p.181.

③ Toby Matthiesen, “Hizballah al-Hijaz: A History of the Most Radical Saudi Shi’a Opposition Group,” p.187.

④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46.

⑤ Ibid.

⑥ Graham E. Fuller and Rend Rahim Francke, *The Arab Shi’a: The Forgotten Muslims*, p. 125.

⑦ Ibid., p.163.

⑧ Karim Sadjadpour, *The Battle of Dubai: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the U.S.-Iran Cold War*,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1, p.12.

综上所述，伊朗在海湾阿拉伯国家扶植代理人的成果寥寥，而海湾阿拉伯国家则利用“伊朗威胁”对什叶派力量进行打压。总之，相对于黎巴嫩、也门和伊拉克，伊朗在海湾国家寻求培育代理人的过程中遭遇了相当大的阻力。“伊朗发展代理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大多数海湾国家拥有的强大的国家强力机构。海湾地区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在安全和情报方面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使得伊朗更难向阿拉伯半岛渗透或获得真正的立足点。”^①

第三，海湾合作委员会的集体安全机制，以及美国对海湾阿拉伯盟友的政治庇护、安全保障也不利于伊朗扶植代理人，而美国、沙特等国家对“伊朗威胁”的夸大和塑造以及背后的地缘政治竞争，也放大了外界对伊朗代理人策略的影响。

在“阿拉伯之春”中，沙特作为海湾合作委员会的领导者，一直特别强调以抵制“伊朗威胁”为由支持海湾阿拉伯国家打击什叶派派的抗议，如2011年以海合会的名义支持巴林逊尼派王室镇压什叶派抗议。^②在此过程中，巴林逊尼派王室、沙特领导的海合会以及在巴林驻有军事基地的美国，都极力塑造伊朗的威胁以及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并特别强调“伊朗是巴林反对派的背后支持者”。^③因此，巴林逊尼派王室联合沙特领导的海合会，在得到美国默许乃至纵容的情况下，对巴林什叶派抗议浪潮的严厉打击。事实上，“尽管巴林和沙特都把伊朗界定为巴林什叶派起义的幕后黑手，但伊朗对巴林反对派的支持主要停留在舆论和外交层面”。^④

因此，在2011年巴林抗议浪潮中，鉴于伊朗支持的“巴林伊斯兰解放阵线”到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在巴林影响甚微，伊朗并无可施加影响的代理人，巴林王室、沙特乃至美国之所以不断渲染伊朗对巴林什叶派的影响，并从教派和代理人渗透的角度进行认知，在本质上是巴林国内政治以及沙特、美国与伊朗地缘政治博弈的反映，这也体现了巴林问题和海湾问题的复杂性。因此，看待伊朗的代理人策略需要实事求是，不可盲目夸大。

①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44.

②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试析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以巴林问题为案例的分析》，第144-146页。

③ Geneive Abdo, *The New Sectarianism: 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Shi'a - Sunni Divid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3, p.16.

④ 刘中民：《试析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以巴林问题为案例的分析》，第145页。

结 语

本文以赞助—代理关系为视角，对伊朗与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海湾阿拉伯国家什叶派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现对本文的主要发现和结论总结如下。

第一，关于伊朗与代理人建立赞助—代理关系的条件。存在边缘化的什叶派及其反政府的什叶派政治组织、政局动荡、存在较强的外部压力是成功建立赞助—代理关系的充分条件，什叶派政治组织所在国家政权脆弱是成功建立赞助—代理关系必要条件。

从比较的角度看，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扶植代理人的条件相似之处较多，诸如都存在处于边缘地位对现状不满的什叶派，都有从事反政府活动的什叶派政治组织，国家政权脆弱甚至有长期的内战和准内战经历，都面临外部力量的巨大压力（如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伊斯兰国”对伊拉克什叶派、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而海湾阿拉伯国家基本上仅拥有对现状不满的什叶派和从事反政府活动的什叶派政治组织，其他条件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均不存在，特别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君主制威权统治下的“强国家”与黎巴嫩、伊拉克、也门长期动荡造成的“弱国家”形成强烈反差。海湾合作委员会的集体安全机制和美国的安全庇护也是伊朗扶植代理人的巨大障碍，这也是伊朗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代理人策略失败的根源所在。

第二，关于赞助—代理关系的过程和类型。伊朗与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赞助—代理关系的建立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一般要经历环境考察、代理人遴选、确定关系、维系和巩固关系等阶段。从赞助—代理关系的程度来看，其类型可划分较为紧密的关系和较为松散的关系。

在本文重点考察的四个案例国家中，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是完成了全过程的赞助—代理关系，双方的关系甚至已超越赞助—代理关系而走向战略同盟关系；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关系处于确定关系以及维系和巩固阶段的过程中，尚未建立稳固、成熟的赞助—代理关系；伊朗与也门胡塞武装尚处在代理人遴选阶段，双方尽管有一定的合作，但尚未确立真正的赞助—代理关系，其未来尚存在不确定性；海湾阿拉伯国家什叶派政治组织，基本上在伊朗遴选代理人阶段便因海湾国家的镇压和软化措施所瓦解。除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为紧密的赞助—代理关系外，其他均为松散的

赞助—代理关系或并不存在赞助—代理关系。从赞助—代理关系的过程和类型的差异来认识伊朗与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关系，有助于相对客观、准确地认识伊朗对中东什叶派力量的关系。伊朗对中东什叶派力量的影响大小各异，外界特别是西方所谓的从波斯湾到伊拉克再到东地中海（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并非铁板一块的整体，更不是紧密合作的政治实体。

第三，关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伊朗与中东什叶派宗教政治组织建立赞助—代理关系深受其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也深受其国家利益诉求的深刻影响，而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远在意识形态之上。

众所周知，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目标是对内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对外通过“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秩序。霍梅尼的伊斯兰主义思想构成了伊朗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根基和实践指南，并突出体现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革命原则。^①因此，伊朗对外“输出革命”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其与中东什叶派宗教政治组织的赞助—代理关系也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输出革命”和扶植代理人的过程中，伊朗一直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使命感，并使伊朗的国家利益受损，特别是在霍梅尼时期更是如此。但即使是在霍梅尼时期，伊朗仍然无法忽视其国家利益，而在后霍梅尼时期国家利益的考虑则更加重要。从理想的角度看，伊朗的目标是同时实现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双重目标，但国家利益比意识形态更加重要。“伊朗政权的泛伊斯兰主义理想是整个地区处在伊斯兰共和国的控制之下，而伊朗是地区领袖和地区霸主。”“这些战略目标与伊朗的民族主义目标、宗教动机是紧密平行的。”“伊斯兰共和国寻求将其激进意识形态输出到边缘化的什叶派人口和可能接受其革命话语的国家。实际上，伊朗政权通过支持附属伊朗的什叶派政府和整个地区的社会运动来扩大这一范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利益往往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其关键决策往往为战略目标所推动。”^②

在伊朗与中东什叶派政治组织的赞助—代理关系中，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实现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兼顾的目标，其突出表现是从黎巴嫩

^①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论霍梅尼外交思想与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第86—107页。

^② Trevor Johnston, et al, *Could the Houthis Be the Next Hizballah? Iranian Proxy Development in Yemen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uthi Movement*, p.4.

众多什叶派政治组织中选择并扶持坚持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真主党，使黎巴嫩真主党成为伊朗输出革命的成功案例，也是实现伊朗国家利益的重要伙伴。而在伊朗与伊拉克、也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政治组织的关系中，伊朗尽管也重视教派认同和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在遴选代理人方面的重要性，但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伊朗并不简单片面地追求伊朗和代理人之间的意识形态趋同，而是选择以国家利益为基础进行务实合作。比较伊朗与真主党以及其他什叶派政治组织的赞助—代理关系可以发现，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显然是伊朗与真主党关系更加紧密、牢固，也更加成功的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时间：2022年7月

(责任编辑：刘 玉)

On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Regional Power's Proxy Strategy

— Taking Examples for Sponsor-proxy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Shiite Organiz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Liu Zhongmin

Abstract: Iran has established cooperation in different degree with Shiit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s called the “Shia crescent ” by the West and som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For this phenomenon, the academic explanation mainly includes “exporting revolution” theory, sectarianism theory and proxy theory, but there are all problems of oversimplification. Only by comparing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cooperation level and achievement effectivenes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Shiit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can its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be relatively accurately understood. Therefore, this paper conducts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Shiit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such as Lebanon, Iraq, Yemen and Gulf Arab state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Hezbollah in Lebanon i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the sponsor-proxy relations, the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Iraq’s Shiit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s a loose sponsor-proxy relations, the relations between Iran the Houthis in Yemen is in the process of sponsor-proxy relations construction,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the Gulf Arab Shiit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s a failed sponsor-proxy relations.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the paper draws three conclusions: First, the conditions for Iran to establish sponsor-proxy relations with agents. The marginalized Shia and anti-government Shiit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turmoil and strong external pressure are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the successful sponsor-proxy relations, and the fragility of the state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successful establishment of the sponsor-proxy relations. Second, the process and type of sponsor-proxy rela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ponsor-proxy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Shiit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s a complex proces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closer relations and more loose relations. Third,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ideolog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ran's sponsor-proxy relations with Shiit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its revolutionary Islamism ideology, as well as by it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importance of which goes far above the ideology.

Key Words: Iran; Shiit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Sponsor-proxy Relations; Ideology; National Interest